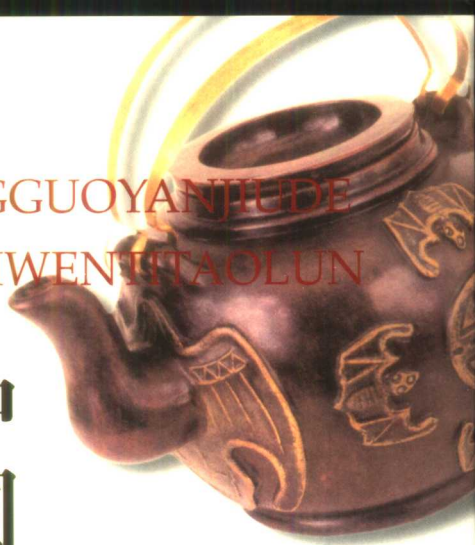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ZHONGGUOYANJIU DE
FANSHIWEN TITAO L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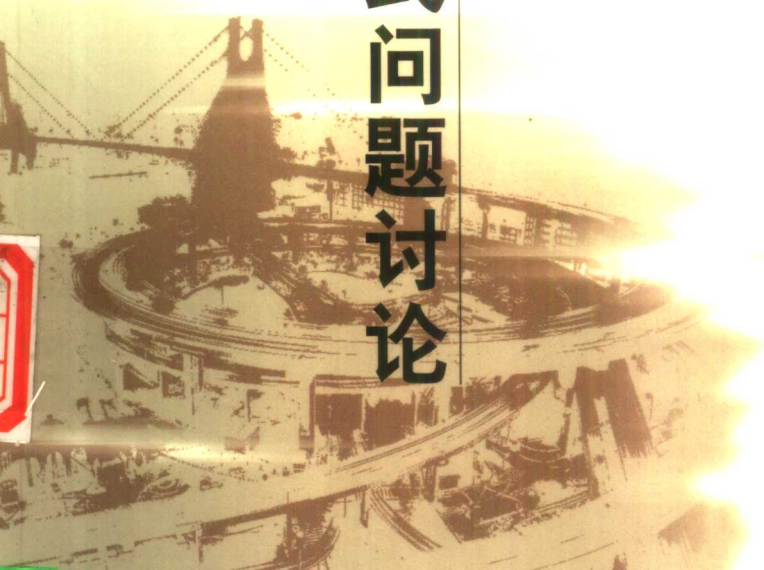


中国研究的

黄宗智

主编

范式问题讨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黄宗智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2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ISBN 7-80149-844-5

I. 中… II. ①黄…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4573号

喜玛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主 编：黄宗智

责任编辑：陈 湛

责任校对：苏 晋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10.25

字 数：241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844-5/K·123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

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會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們既不喪失自我認同的堅實前提，又能跟現

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目 录

专辑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

导 论	黄宗智 3
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	杜赞奇 9
在西方发展乏力时代中国和西方理论世界的调和	亚历山大·伍思德 27
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	周锡瑞 43
讲述中国史	魏斐德 73
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	黄宗智 102

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编者前言	黄宗智 137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 ——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魏斐德 139
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	罗威廉 172
中国公共领域观察	玛丽·兰金 196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

- 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议程 赵文词 225
- 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 希斯·B. 张伯伦 241
- 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黄宗智 260

跋：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

- 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杨念群 289

**专辑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
理论与实践**

导 论*

黄宗智

这个论文集的最初想法是围绕“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主题（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来组织讨论，或许以两位与会者之间的争论为开端。随着会议议程的进展，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如果彼此之间的交流不是以针锋相对的互相批驳为指向，而是作为通过在更为广阔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的主题下由每个讨论者作自我反思，这样的交流也许会更富有成果。其后，有的人在撰写论文时，强调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更多于理论的探讨。展现在此的这本论文集是最终的产物，文章事实上包括三个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普遍意义上理论的运用与误用，以及历史研究实践。

-
- * 1997年5月10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召开了题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研讨会，本论集就是以该讨论会为基础。我要感谢所有与会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他本来未参加会议，却为这些论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这部论集形成了“中国研究中的范式问题”系列专号的第5部分。最近的两期是“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第19卷第2期，1993年4月）和“再思中国革命”（第21卷第1期，1995年2月）。——作者注

后现代主义：赞同与反对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的文章论说需要对现代民族国家在史学领域传播的民族主义主题进行“反思”。杜赞奇特别指出了将历史等同于民族史，将历史归于线性发展，和将历史归纳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三点。他最后总结道：作为史学家，如果我们不愿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充当“被动参与者”的角色，那么就需要对自我进行反思。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杜赞奇所认为的有关民族国家主义对历史著作所具有的强有力的组织性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论我们的背景或内心倾向，要求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个国家，并且是单一个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在国家边界之内用“想像的共同体”^①来划分历史才是理所当然的，并将之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阶段。对于这些现代主义假设的批判性检讨的确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贡献。

与杜赞奇相比，本次讨论会的其他与会者虽然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更多保留，不过大家都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其他方面的贡献。亚历山大·伍德塞 (Alexander Woodside) 肯定了它对推翻美国大学中社会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间旧的区分，以及提高我们对实证主义科学的用语与假设的敏感所做出的贡献。我自己则提到后现代主义对纠正旧社会史中“隐含的唯物主义”和诸多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所做出的贡献。

① 当然，这一短语源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体：对民族国家主义的起源和传播的反思》(修订本)，(伦敦) 维所出版社，1991。

但是亚历山大·伍德塞和我的论文的重点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伍德塞特别指出后现代主义由于其“欧洲中心感”，而导致无视非西方国家人民对现代化的渴求。后现代主义把西方所关注的问题普世化了，这一点特别反映他们在认识论问题上的“着迷”和“焦虑”（伍德塞认为这种特殊的西方式倾向可以追溯到教权衰落时期），这样的倾向与“东方主义”很相似，虽然这正是他们历来所批判的。我在论文中特别强调了萨义德（Edward Said）和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主观主义认识论。当把事实化约为单纯的主观再现时，他们抛弃了对历史研究实践来说至关重要的真理理念。

周锡瑞（Joseph Eshrick）通过何伟亚（James Hevia）新近有关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的著作而提出了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这本书被一些人肯定为后现代主义方法指导的新学术研究样板。周锡瑞给出许多例证，指出何伟亚书中众多对文本的误读和他认为的对论据的误用。他否定了何伟亚对清廷处理此事件的态度地重新建构。周锡瑞认为在该研究中的众多失误也许就是为何伟亚深陷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之中。

理论和实践

以上简略提到的论题能够而且应该被放在更大的、有关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具有普遍意义关系的情境中。虽然杜赞奇将“理论”的定义清楚地限定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理论，但我们的绝大多数人所使用的含义比他广阔。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贡献在于，他以自己的经验，从史学的历史和理论观点来重新审视叙事史中出现的问题。他审视了许多永恒性的问题，如叙述史家如何划定历史与小说的区分，如何发现适用技巧来结合叙述与分析（亦即事实的描述与评论），怎样在讲好一个故事

的同时又保持其历史原貌。由此魏斐德让我们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其他理论，并有助于将后现代主义提出的论题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

我的论文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回顾了在过去 30 年中我们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理论热潮。这篇论文也可视为是反对绝对化了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备忘录：它们的理论并不是惟一的理论，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有关理论和研究之间关系的论题的理论。

在谈到我们自己的历史实践时，魏斐德和我的论文将这些论题从纯理论讨论领域中抽出，放入实际的历史写作中。虽然历史写作文风迥然不同，但我们的共同主题是如何协调事实和概念。我的论文讨论了如何通过理论与对话，从新的证据中提炼新的概念。魏斐德的文章，至少在我看来，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

共同基础？

这部论文集的撰著者在各自文章中表达了不同的理论旨趣，如果读者只注意这些分歧，也许会认为我们 5 个人之间少有共同之处；确实，有的读者之所以被这部论文集吸引是因为希望看到一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战。但在我看来，事实上，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共同基础，这比我们之间的分歧更为重要。

我们所有人都是以实践者而非理论家的身份从事写作。尽管我们的理论立场有明显差异，但是我们在有关历史学的实践上却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也许比我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承认的还要多。无论在这些有关主观性和客观性、自我和历史、概念和事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各自的理论立场如何，大家在实践中都遵循专业的加脚注的习惯做法。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中都奉行一个准则，即要通过举证他人可以去核实的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何伟亚，虽然遭受周锡瑞的极力批评，写作的理念也是最严格的

文本学术

尽管有这样成为共识的对论据诚实性的承认，但我相信这本论文集的所有撰著者都同意后现代主义反对庸俗的社会科学中对“假设”和“论据”之间所做的僵化的区分。历史学家总是把著作建立在论点与论据之间结果开放、持续不断的互动关系基础之上，凭此叙述，分析特殊的历史情境或特定的历史事件。在很多时候我们著作的结尾不同于起初对它们的假定。我们中很少有人，应该说在与会者中没有人，自以为是利用普世化理论中推导的既定假设而进行纯科学性研究，从而搜集它的所谓“证据”。虽然这是“提供研究基金”的社会科学机构的要求，但这并不是我们中的多数对待我们工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后现代主义并无分歧。

我们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分歧不在于它对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评，而在于它的偏激的主观主义。正如我在论文中表明的那样，如萨义德和吉尔兹那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会抹去（客观）事实和（主观）解释之间的所有区别，并坚持所有事实最终只不过是再现而已。这种立场在我们看来导致了一种结果，它与后现代主义欲使主观和客观之间关系变得问题化的最初意向相对立。虽然对无视研究者主体性的客观主义进行批判是正确的，但这却走到了否定存在任何与研究者的主观性相分离的外在事实的另一个极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事实上是抹煞了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的问题，通过用一个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化约主义取代了它反对的客观主义/唯物主义的化约主义。

读者会看到，事实上这些与会者在这一核心论题上并无分歧。即使是我们中最赞同后现代主义的杜赞奇，也清楚地区别自己与被她称为福柯式的认识论“封闭圈子”。即使是周锡瑞，我们中最为激烈的反对后现代主义者，也会同意这一点。

我在上文反复论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观点。在这样一个时

期，即受理性选择理论影响下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与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人文科学的极端主观主义倾向之间的分化不断增长的时期，我认为指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事实上在实践中所持的共同基础是重要的。我们中极少有人将自己视为理论家。而那些视自己为理论家的人当然可以不受经验论据和历史实践的束缚而自由地将其观点推至极至。结果招致极不协调的关注。但我们余下人中的大多数却是继续埋身于论据和档案之中，尽管有时也有自己的理论倾向。无论有多曲折，我们继续潜心于在论点与论据中构筑合理的关联；无论有多困惑，我们继续以追求真理为理念而工作。事实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不论职业中的新潮理论如何冲击，正是这些不断的尝试构成了“学术”一词的核心含义。这部论文集，就其结果而言，是反映我们共有的学术理念而不是彼此间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歧。

(姚昱、马钊译，译文已经作者审校)

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

杜赞奇

历史学家和历史系讲授的课程通常不反映该领域内达成共识的知识。史学理论偶尔会模棱两可地体现出普遍性，但其实它是植根于欧洲这个特定的地域。历史学可能是惟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作为一个对史学范式如何形塑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这一问题特别有兴趣的人，我相信强调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这一问题相当重要。只有审视理论的作用，才能阐明为何在撰写历史时采取反理论的态度是必要和值得的^①。

我在德里著名的教会学校圣·斯蒂芬学院完成本科学业，该校为文科学生提供了三个专业方向：英语、经济和历史。精通高等数学的人学经济，浪漫的人学英语，其余的都学历史。简而言之，学历史实际上就是希望把我们培养成为日后的公务员。这也许是我首次置身于历史学与“国家建构”这一关联之中。不久，我就认识到，学院中近代意义上的历史专业建立之日正是在近代

* 著者注：感谢 Perry Anderson, Dipesh Chakravarty, James Hevia, Bruce Lincoln 和 Sarah Maza 在本文撰写时给予的帮助。

① 所谓理论，我是指，在历史知识基础上的反思，包括历史概念的预设、历史学家的作用、再现历史的手段等。